

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

赵建军¹, 修涛²

(1. 华侨大学, 福建 泉州 362011; 2. 辽宁大学哲学系,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文章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技术理性批判浪潮的兴起及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关系; 技术悲观主义的本质所在; 技术悲观主义对我国现代化的启示。文章强调开展技术理性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和协调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的关系。

关键词: 技术理性批判; 技术悲观主义;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N 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Q(2001)02-0056-05

一 技术理性批判浪潮的兴起

理性, 一直是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特别是近代经笛卡尔、培根建立起的理性主义哲学(又称科学主义)主张理性思维至上、科学知识万能、逻辑方法绝对无误, 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的人, 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变成概念编织起来的单调世界。然而千疮百孔、丧失人性、危机四伏的现代工业技术文明, 却使得人们对理性产生怀疑。从19世纪中叶, 特别是于20世纪初开始, 在西方哲学中, 形成了一股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又称人文主义)的思潮。叔本华第一次大胆说出人的欲望、痛苦构成人的本质; 尼采宣称酒神精神、人的本能冲动是人性最深刻的表露; 柏格森强调‘生命之流’, 指出直觉是通向实在之路; 弗洛伊德揭示‘无意识’是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们否认理性与科学具有认识实在、把握世界的绝对权威, 他们呼唤失去的人性、自我, 把人从抽象的思辨的‘理性王国’拉回到现实人间。

20世纪, 理性主义借科学技术之手开始指点江山, 文明社会的技术化特征露出端倪, 技术理性开始控制文明社会的进程和方向。它所带来的‘病态社会’、‘单面人’、核武器扩散以及全球生态危机, 激起了西方学者的激烈批判。以人文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主流。像文化——历史主义的代表斯本格勒把文化与文明对立起来, 认为文明是文化的终结, 也即末日的来临^[1]。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进行追问, 却发现人、自然连同上帝都已经被一种‘展现着’的技术关系所笼罩、所遮蔽, ‘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所控制不了的东西’^[2]。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

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资本主义‘物质丰富, 精神痛苦’的现实, 揭示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性, 技术的合理性转化为统治的合理性, 其结果必然是‘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3]。‘技术统治论’盛行。技术自主论者埃吕尔指出,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技术社会是非人性化的社会, ‘它使得现代的人类不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 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手段’^[4]。熵增论者J·里夫金、T·D·霍华德认为, 人类文明的进程, 其实是一个不断衰亡的过程, 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消耗, 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 能量转化的速度就越高, 有效能量消耗的就越多, 环境的混乱程度也就越大。‘不论我们作出多大努力, 世界总在堕落之中’^[5]。罗马俱乐部A·佩西、D·米都斯等则对日益恶化的人类环境提出质疑, ‘这个世界系统的基本运行方式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 以及随之而来的崩溃’, 只有停止经济增长, 才有望躲过文明劫难^[6]。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J·F·Lyotard)、福柯(M·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罗蒂(R·Rorty)等进一步发扬法兰克福学派理性批判的传统, 指出人类已经步入‘知识爆炸’的后工业社会, 旧有的概念、规则不再有效, ‘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段组成的’。人们踏上了‘不归之路’, 多样性、非一致性、不完满性、不确定性、破碎性、否定性、反正统性已构成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新的思维观念。主张用‘游戏’的规则取代普遍的必然真理, 用‘流浪者的思维’横扫决定论的权威、拒斥整体的专制, 他们把‘摧毁’、‘冲突’、‘消解’看作是‘一种生成’、‘一种创造’, 而‘不再渴望业已永远失落的家园’^[7]。

【收稿日期】 2000-11-10

【作者简介】 赵建军(1961-), 男, 哲学博士, 副教授, 兼任华侨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 主攻技术哲学;
修涛(1963-), 副教授, 主攻技术社会学、生态哲学。

西方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否定、对科学技术的批判社会思潮,滋生出一种对文明社会未来发展的恐惧心理、无奈情怀,对未来的忧虑胜过希望,甚至对未来彻底绝望。它们从一个侧面被人们看作技术悲观主义,与理性至上、科技万能的技术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引起学界和公众的强烈反响,人们对此褒贬不一^[9]。

二 技术悲观主义的本质所在

技术悲观主义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般重要的社会思潮,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发表,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1979 年和 1992 年,以技术悲观主义为议题,分别在美国和以色列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就以色列论坛的主题,编辑出版了《技术、悲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文集,收录在美国 1994 年《科学社会学年鉴》里,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但是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学术界专论技术悲观主义的理论文章却很少,专著则几乎没有。凡有涉及技术悲观主义这个词的,多是在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在评述某位学者的思想观点时,指出带有技术悲观主义的色彩,而缺乏系统研究。因为在我们谈论某种理论属于技术悲观主义,某位学者是技术悲观主义者时,我们甚至不清楚什么是技术悲观主义,对它的划界标准、产生背景、价值功能等更是模糊、混乱。目前学术界尚无人明确宣称自己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不少学者如海德格尔、埃吕尔、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以及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他们对技术的批判是深刻的,并对技术的恶果和无限制的发展表示担忧,但他们并不彻底反对技术。同样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学者像托夫勒、贝尔、维纳等亦对技术强权和引发的危机深表忧虑。

技术悲观主义,由于沾染一个“悲”字,它在修辞学上的消极、无奈含义,它对技术所持的怀疑、批判、恐惧和否定态度,使得学术界不做深入的研究而多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待之。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潮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未加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就对技术悲观主义断然全盘否定是不可取的。技术悲观主义同样有其合理的内核和有益的忠告,是不该轻易淡化和排除的^[9]。这也暴露出我们在探讨这一问题上的传统心理和偏见,或者说,我们正处在理性主义统治之中、处在科学技术万能之中。这种倾向是危险的,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就是前车之鉴,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困境预示着西方社会危机的再现。难道我们用 2—3 代人的努力达到的目标,还要再用 5—6 代人的代价去克服因达到这一目标而产生的恶果吗? 研究技术悲观主义将有助于我们来审视自己的行为,把握人类的未来。

关于技术悲观主义,目前学术界大体有以下几种理解,其一是:技术悲观主义就是反技术主义。美国学者沙缪·C·福罗曼(Sauel C Flor man)持这种观点^[10],我国学术界多也持有这种观点^[11];其二是:技术悲观主义是“超越论者”。这是荷兰学者 E·舒尔曼的观点^[12];其三是:技术悲观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我国年轻学者高亮华、陈红兵等持有

这种观点^{[13][14]};其四是:技术悲观主义是与技术批判主义相并列的一种哲学思潮。国内技术哲学专家陈昌曙持这种观点^[15]。

笔者认为,就一般意义上来看,可以对技术悲观主义作如下理解:

1. 技术悲观主义是根植于人类潜意识层面的忧患意识

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理性存在,实质上是根植于人的潜意识层面的忧患意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技术变化超前、文化滞后,新社会运行机制与原有价值观冲突,导致人的心理失衡、自我在现实与理想中发生错位后的显现。

人不是先知,未来对人总是一个神秘的、不确定的未知世界。但是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促使人类关注自身命运,对人类活动进行超前思维。而早期人类所走过的艰难探险之路,形成了人们对未来认识吉凶掺半的心理意识,这就是忧患意识,它一直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方式。

在对事物的认识中,存在着肯定性与否定性两种判断,黑格尔把对事物的肯定性判断称为“善”,把对事物的否定性判断称为“恶”。忧患意识实际上正是这种“恶”的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直接情感判断。忧患意识之所以表现为否定性思维,是因为本能中含有忧患情感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当客体的质料与主体意识中的形式(心理期望)发生背离时,就表现为否定的价值取向。这种否定性反映了主体的能动性、批判性和建构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意识的本质是思维,而思维的本质是否定,怀疑性就正是否定性和无限性的表现。否定性思维能使主体通过自身能力的实现,摆脱机械论和命定论。对事物的怀疑和批判,防止了认识的片面性,从而使意识的触角更接近与客体的内在本质。康德就曾以“批判哲学家”自居,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避这个批判的。宗教企图躲在神灵的后面,法律企图躲在尊严的后面,而结果正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怀疑,并失去人们对它们真诚尊敬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的”。这种怀疑、批判包含着肯定,包含着一种创生的萌动,包含着一种合理的期望。因此,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理性的情感判断,具有很强的透视功能。

忧患意识本身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古代忧患意识所具有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从野蛮状态向文明时代过渡,人的社会性同其自然性相冲突、自我脱胎换骨,处于一种经常性的不安和痛苦之中的过程。它集中体现在人的自我意识和内心之中。

近代前期,人们的忧患意识一度被强大的技术力量所吞没(卢梭例外,他的观点仍然是古代忧患意识的延续)。“技术统治思维”取代了忧患意识,人们沉浸在技术的胜利之中。但是忧患意识并没有消失,而是滞留在潜意识中。19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技术理性的勃兴和全面渗透,技术的不良后果、技术对社会作用的加强以及技术特性的充分暴露,使得忧患意识再度兴起。

如果说古代忧患意识仅仅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流

露,是一种无知驱使下的杞人忧天,那么,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者等所表现出的现代忧患意识,则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反思,是在理性引导下的、对人类未来精神家园的呵护。例如,科技成果军事化所带来的战争、暴力、核威胁和相互残杀而表现出的社会忧患意识,使得人们不仅对天国丧失了信心,而且对地球和它的臣民也颇感失望。因全球问题及其折射出的生态忧患意识,则在人们心理上蒙上了一层对人类未来前景暗淡的阴影。

2. 技术悲观主义是人类否定性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对技术悲观主义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与人类文明进程存在一种“伴生”现象。人类文明进程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目的和意志的实现过程,人类有理由为此骄傲和自豪。所以乐观进取和对未来充满信心是人类意识的主流。但是,由于人类文明进程主要是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实际上是个技术化的过程。而技术化过程必然改变和影响人的天性和自然的本性,必然导致人、技术、社会、自然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为解决这些冲突,人们去发展新技术,新技术又带来新的问题。我们虽然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但所花费的代价常常可以抵消上升过程本身,把我们拉回到“原点”,而且是面目全非的“原点”。文明社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个怪圈中演进着,不仅发展要靠技术,解决人类的困境也离不开技术。可再精致的技术,也不可能让“外部代价”销声匿迹。“未来文明的原点”在哪里?不仅古人捉摸不定,拥有知识的现代人更感到飘忽不定。不仅人们有理由对自身命运和未来前程担忧,而且技术所表现出的邪恶力量迫使人们拿起批判的武器,进行批判性阐释。这就是否定性思维的表现。只要技术的功利性特征不变,只要技术理性的霸权存在,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就不会消失。

3. 技术悲观主义是技术理性批判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技术理性规范着现代文明的进程;它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统治意识;它带来了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技术化。技术理性的这种角色使它具有了理性至上、征服自然、效益优先的特性,它把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本身,都设定为可控制、可设计的“技术存在”,并以这种技术存在为对象建立相应的技术体制和技术系统。正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所说的,现代人把存在的整体当作生产的原材料,并使整个世界服从生产的视野和秩序。

技术理性的文化霸权,使它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负面性:科学与人文的矛盾对立加剧;以人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进一步走向极端化;自然价值沦落;全球问题爆发等等。高亮华就技术理性的负面性概括了这样几点:①技术理性以支配自然为前提,它将导致外在自然的破坏和人的内在属性的限制。②技术理性以数学式思维作为认识和解释自然的工具,它把一切包括人都作为可计算的对象,世界失去了多样性。③技术理性追求有效性思维,它只看重效率,而无视价值和公平。④技术理性以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实证主义为其理论依据,以知识的基础代替人生的意义,以功利主义之眼看世界¹⁹。

技术理性存在着诸多的负面性,因而,对技术理性进行批判就成为必然。技术悲观主义正是对技术理性负面性进行批判而形成的一种思潮。尽管文明的趋势是社会理性化的不断强化,但是应当看到,理性化隐藏着文明的陷阱,技术理性的强势就意味着价值理性的陨落,就意味着人性的异化和文化的断裂。要进行技术理性的批判,就不能不拿起技术悲观主义的批判武器。

三 技术悲观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进展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回顾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世纪里创造出比历史上其他所有时期所创造的总和还多的财富,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扮演了重要角色。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就摆脱不了贫困和落后;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没有文明发达的今天;没有科学技术进步,也就没有五光十色的舒适生活。然而,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两重性,这就是所谓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科技进步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打开了装有各种灾难和祸患的“潘多拉魔盒”。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人类以顽强的意志对自然不断探索的结果。探索是已知世界向未知世界的拓展。由于自然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人类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在我们为开创文明社会已经付出沉重代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深刻的检讨和反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1. 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难选择

西方现代化进程是在技术理性引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和社会消费方式的现代化,即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技术理性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导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工业化发展过程。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实现是以全球的生态危机、精神危机为代价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摆脱贫困、加速实现工业化是首要的、紧迫的任务。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超出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反倒是西方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后期所表现出的全球问题,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信仰问题等,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刚刚拉开的序幕中暴露无遗。发展和环境的矛盾不得让我们驻足沉思,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不得让我们瞻前顾后。在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加速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科技理性与人文情怀协调、融合的发展模式。两大战略的立足点、侧重点并不相同,发展目标甚至矛盾,我们既不能割舍一方,也不能偏爱另一方,但我们又必须使二者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这恰恰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选择。它也引起了我国学者对未来文明发展命运的广泛思考。

2. 技术悲观主义对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人们习惯于承认环境

保护主义、绿色和平组织、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做的努力,把《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等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理论前奏。这种观点并没有错,因为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是导致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现实因素,有关与环保相关的自然构成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主要因素。

笔者更倾向于把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观点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以最具悲观色彩的《增长的极限》为例,它从三个方面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首先,罗马俱乐部全球问题的提出和全球意识的确立,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观建立的理论基石。我们知道,全球问题是指那些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现代人无法逃脱、子孙后代深受其害的整个世界的总问题。如全球变暖、人口爆炸、资源匮乏、南北发展失衡等。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建立全球意识来解决全球问题,因为全球问题具有以下三大特征:全球问题具有全球规模的普遍性;全球问题涉及人类眼前和长远的根本利益;解决全球问题需要树立新的价值观——全球意识观。所以只有用整体性、公平性和持续性的准则,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才有可能摆脱危机。这一思想和原则恰恰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的出发点和理论内核。

其次,罗马俱乐部创立的全球模拟方法,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全球模拟是由美国学者W·福雷斯特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它是运用系统动力学和计算机技术,把对全球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参数定量化,建立社会生态系统仿真模型,动态模拟全球变化及预测人类未来的方法。《增长的极限》报告正是运用这一方法,通过考察五个方面的全球增长趋势,以人口、粮食、资本、资源和污染为基本变量,首次构造出全球社会生态系统的逻辑仿真模型,向人们展示了12种不同的人类前景。尽管这一方法把社会政治因素排除在外,预测未来有失水准,但它在处理全球复杂大系统问题上,是行之有效的。它不仅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所接受,而且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的主要方法之一。如《二十一世纪的日本》《2000年的中国》《2000年的地球》《21世纪议程》等全球战略和区域战略的制定,都程度不同地应用了这一方法。

再次,罗马俱乐部对传统发展观的否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观扫清了思想障碍。近代工业文明社会形成了一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由于它在摆脱贫困、增加财富、推进工业化进程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很少注意它所存在的弊端和隐患。罗马俱乐部第一个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批判。《增长的极限》报告用大量数据和事实指出,由于地球的容量有限,资源有限,增长也必然有其限度。不惜一切代价,用掠夺的方式、倍增的速度去获取经济的增长,注定要从自然界和人类两方面都达到极限,从而引起灾难性的冲击。罗马俱乐部提出的“经济零增长”虽然值得商榷,但它提出的资源有限论、环境价值论却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1]。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背景,可以看出它与当代技术

悲观主义的突出代表——罗马俱乐部的思想有着某种关联。本人认为,从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看,技术悲观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理论都是人类危机意识的表现。所不同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超越了技术悲观主义对未来的消极心理和“乌托邦”幻想。然而,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追求的文明发展模式与现代工业发展模式是对立的,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面临着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双重挑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挖掘出技术理性与可持续发展之张力,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确立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并行不悖、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3. 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学批判是建设性的技术理性批判

如果说技术悲观主义的社会学批判、文化批判,其结论带有明显的、消极的、反叛的色彩,它最终会把人们引向非理性的自然主义、虚无主义的陷阱,该遭致学术界的摈弃的话,那么,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则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特质,我们可称之为建设性的技术理性批判。首先,它的依据是建设性的。当我们在谈论斯本格勒的“没落论”、汤因比的“挑战论”、海德格尔的“死亡论”、弗洛伊德的“压抑论”时,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均来源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这就使得他们的观点明显地带有非理性、反社会的倾向。生态学批判则从生态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未来学等多学科相互作用跨学科理论为出发点,以人性与自然性相统一为基础,以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为核心来阐述当代世界的危机状态。尽管也不乏悲观言论,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确立一种全球意识和全球发展战略。这便是人们今天所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说,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它的研究方法是建设性的。技术悲观主义的社会学、文化批判主要运用分析、比较、思辨等哲学方法,集中对技术恶果、社会、人性化等领域进行探讨。他们所描述的丑陋社会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意识,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则运用系统论、数学、统计调查等科学方法,以及哲学的视野进行跨越性思维,即把地球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来进行全球性模拟,它使我们认识到了当代世界的关键性问题所在。

再次,它对未来文明的态度是建设性的。技术悲观主义的社会学、文化批判把技术进步同人性发展完全对立起来,把技术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动乱、人性变态、自由丧失看作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对文明的仇视和对未来的绝望。贬斥技术“返归自然”是其乌托邦式的心愿。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学批判虽然也揭示了技术化社会的困境,但它并不认为人类困境是不可克服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寻找替换技术,就有可能使我们走出困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困难重重,任重道远,它需要强有力的对现代文明社会发展模式的批判武器,而技术悲观主义的生态学批判恰恰扮演了这一角色。

4. 坚持技术理性批判之研究,引导中国现代化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技术悲观主义一直未展开系统的、

深入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多以简单的否定把它拒之理论探讨之外。事实上,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的“伴生”现象,确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古代人排斥技术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古代人把道德与技艺截然对立起来?为什么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普遍带有技术悲观主义倾向?罗马俱乐部产生的深层意义是什么?现代技术文明的缺憾在哪里?怎样克服等等。本文对技术悲观主义的上述研究,还只是个开始,随着技术哲学理论的逐步完善和现代化实践的逐步展开,相信学术界对技术悲观主义的研究会深入一步,对技术文明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将有更深入的把握。

中国目前所走的现代化之路,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个技术化的过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仍旧是技术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格局。这对摆脱贫困、增强综合国力是重要的,但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人类生存环境来说则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又出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用价值理性来限制日益膨胀的技术理性。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是技术理性占上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得以迅速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做出退让,或实施不到位,使得我国环境问题和人类生存状况处在恶化之中。如人口压力、环境污染、城市化隐患、信仰危机等,我们已经比某些发达国家严重得多,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是极其危险而可怕的。

目前,西部大开发,使我国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面临新的挑战。不论我们采取何种措施,维护生态平衡、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必须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我们应冷静而客观地面对现实,阻止和抛弃任何有损于子孙后代的急功近利行为。虽然技术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自然的冲突,虽然技术的本质决定了人类无法彻底消除公害污染,虽然技术理性还将在相当一个时期居于支配地位,但只要我们人人都树立起了全球忧患意识,我们就有可能把危机和冲突限制在最低限度内。

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只要我们不忘反省自己,坚持技术理性批判,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携手共进,管理好地球,

未来就将属于我们。

【参 考 文 献】

- [1] 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54.
- [2]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J].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945.
- [3] 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J].工业革命和新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 [4] J·埃吕尔·技术的社会[J].科学与哲学.1983(1).
- [5] J·里夫金等·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32.
- [6] D·L·米都斯·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0.
- [7] 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34.
- [8] 赵建军·追问技术悲观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4).
- [9] [15]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238.
- [10] Samuel C·Flor man·The Existential Pleasures of Engineering[M].St·Martin Press 175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10010.45.
-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Z].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216.
- [12] 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0.
- [13] [16]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1,164~165.
- [14] 王树茂·现代科技与人的心理[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78~98.
- [17] 赵建军·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透视[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

(责任编辑 殷杰)

(上接第55页) 生命、生活三个层次上说明人类精神生活的一致性或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将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综合创新是生命哲学研究运用的根本方法。中外哲学不乏对人生意义的论述,但要根据当前技术文化的状况,提出切合实际的生命哲学的答案,惟有综合创新的途径才能完成。此外,理性分析是生命哲学运用的基本方法。面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需要分析判断其中与生命哲学有关的文化问题,面对浩瀚的历史资料和历史文献,需要分析整理与生命哲学有关的内容,没有全面的理性分析方法是不能胜任的。另外,在确定人生意义这个疑难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

【参 考 文 献】

- [1] David Elliot, Uniqueness, Individuality, and Human Cloning, se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 15, No. 3, 1998, p. 217.
- [2] Egbert Schuurman,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of Technicism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se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Vol. 3, No. 1 (on Yahoo, internet: <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SPT/v3n1/schuurman.htm>).

(责任编辑 郭晋风)